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
暨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共创历史：精英人物与近代中国” 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上册)

中国·广州
2013·12·6-9



目 录

1、王宏斌：魏源两次前往浙江军营讹误考.....	1
2、冀满红、杜贺：中兴良将、兴废能臣：晚清名臣许应鑾.....	17
3、张华腾：清末改革第一人：袁世凯与清末社会变革.....	26
4、关威：再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	42
5、陈才俊：1911年后美国传教士对袁世凯之态度.....	49
6、李细珠：神妖之间的人——慈禧太后形象三面观.....	63
7、戚学民：明立宪之理：浅析《政治讲义》理论意义.....	96
8、李皓：试论赵尔巽与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	139
9、马忠文：于右任早期反清革命的“罪证”——台北故宫军机处档案所见抄本 《半哭半笑楼诗草》.....	162
10、左松涛：新出三种辛亥山西新军起义文献真伪考——兼析阎锡山与姚以价的 “首功”之争.....	176
11、陈明、陈忠平：清季民初汤化龙与革命党人关系述略.....	196
12、杨雄威：革命与道德——沪军都督陈其美“吃花酒”的历史解读.....	215
13、左双文、王英俊：王宠惠的战后集体安全思想.....	224
14、杨瑞：北伐前后农学精英的政治立场与事业转向.....	237
15、李翔：由合作到局部遣返：信仰相歧中的党军体制.....	251
16、李玉：试论蒋介石关于国民党弊端的忧思：以1926~1937年的蒋介石日记 为视阈.....	263
17、齐春风：陈德征——一个国民党中层干部的浮沉.....	278
18、肖自力：夹缝中的因应：论何键的地缘政治生存及其终结（1929-1937）.....	294
19、王明前：何健的“小康”与“大同”——何健统治湖南期间的政治哲学.....	320
20、张晓辉：危难之中显真情：卢作孚与杜重远的交往.....	336
21、陈志雄：陆征祥与《〈益世报〉海外通讯》.....	347
22、马陵合：地方督抚与晚清铁路政策的游离：以锡良为例的研究.....	358

23、朱从兵：岑春煊的铁路建设思想——以 1906 年粤汉铁路风潮为视点.....	379
24、郑成林、张世慧：澳门商业史研究的回顾及前瞻.....	409
25、刘增合：窘困下的“同盟”：咸丰朝联省合筹军饷研究.....	426
26、王静雅：常态与异态之间：光绪初期规复淮盐旧制中的江鄂川之争.....	449
27、付海晏：晚清贻谷垦务案研究.....	463
28、高龙彬：陈垣与清末东三省鼠疫及对公共卫生的思考.....	510
29、王鸿志：逃亡与职守：民国改元劝业道的际遇及抉择.....	521
30、李淑蘋：程天固与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建设.....	535
31、胡永恒：马锡五审判方式：被发明的传统.....	545
32、江中孝：端方《劝善歌》的出笼、传播及其社会影响.....	558
33、赵利峰：清末梟雄刘学询的家世——以其父香山买办刘绍宗为中心的考察.....	560

魏源两次前往浙江军营讹误考

王宏斌（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由于林则徐和魏源关系密切，同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重要人物，学者们在讨论时非常重视其活动和友谊关系，但由于资料记载较为模糊，出现了一些虚假推测、以讹传讹现象。经过仔细辨析各种说法，笔者认为，魏源于1840年秋冬到1841年春天曾经前往浙江军营一次，而非多位学者认可的两次。无论是魏源1841年春季前往定海说，还是1841年秋季以后魏源前往定海说，均无确据，属于虚假推定。无论是林则徐推荐魏源说、裕谦聘请魏源说，还是裕谦与魏源相互慕名说，均无资料支持，纯属臆测。

关键词：魏源 林则徐 裕谦 黄冕 军营

由于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后编撰了《海国图志》，更由于林则徐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核心人物，人们在研究林则徐和魏源活动时，在探讨他们两人的关系时，非常关注其1841年8月在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的会晤，非常关注魏源在浙江军营的生活。试图寻求林则徐为何委托魏源编撰《海国图志》，魏源为何欣然从命的回答。但是，由于魏源到达和离开浙江军营的时间，各种记载比较模糊，导致许多误读、臆测，以讹传讹，其相关结论值得商榷。

一 魏源往返宁波、定海的各种说法

魏源之子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说：“道光二十二年，英夷犯海疆，江浙震动。钦差大臣长白裕公谦督浙江防剿，延致幕府。数月辞归。”^①这是1842年魏源接受裕谦邀请前往定海说^②。

^① 李柏荣：《魏源师友记》，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页。

^② 受此影响，有的学者如是说：“二十二年，逆夷犯海疆，裕靖节公督浙防剿，延致幕府，数月辞归。”大陆出版社编：《中国近代学人象传》，《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第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36页。

李汉武说，林则徐 1841 年 8 月过京口，“魏源闻讯从扬州赶来迎接。接受林则徐推荐，魏源入裕谦军幕，赴定海，林、魏二人此次见面遂成永诀。到定海后，魏源提出暂弃定海，专守镇海和改造防御工事的正确主张，都得不到采纳，大失所望，当即辞归扬州。”^①又认为魏源是经过林则徐推荐才成为裕谦的幕宾的。由此推断“魏源到达定海前线的时间是公历 1841 年 7 月底以后和 10 月 1 日定海第二次失陷之前。”^②还根据《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的一段话推论说，魏源到达定海后，提出了两条防守决策：第一条是暂时弃守定海，重兵防守镇海海岸；第二条是改修定海工事，要筑内城，勿包外埠。由于其建议没有被采纳，“魏源离开军营”，返回扬州^③。这是魏源 1841 年秋季前往定海军营说。原因是魏源接受了林则徐的推荐，才成为裕谦的幕僚。从定海辞归的理由则是，魏源的防御计划没有被采纳。

杨国桢先生在其《林则徐大传》中指出：“鸦片战争爆发，他拥护抗战。定海失陷，英军直叩天津，琦善出面议和，定海人民自发起来抵抗，俘获英军炮兵上尉安突德

(P. Antruther)。魏源应友人的邀请，于是年 9 月底（九月初）到宁波军营，参与审讯安突德，并著文《英吉利小记》，揭露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蓄谋和罪行。”又说，“1841 年 3 月，魏源在林则徐的推荐下，愤然弃笔从戎，投入裕谦幕府，到浙江参谋战事，并随黄冕等人东渡定海，处理收复后的善后事务。不久他看到朝廷和战不定，‘知与愿违’，忧愤辞归扬州。”^④与李汉武的说法明显不同，杨国桢先生在此认为，魏源曾经两次前往浙江军营：第一次是 1840 年 9 月，魏源主动前往宁波，参与审讯安突德；第二次是 1841 年 3 月，前往定海军营。就第二次魏源前往定海的原因来说，虽然李汉武与杨国桢都认为，是魏源接受了林则徐的推荐，而在时间上却明显不同，互相抵牾。李汉武认为，魏源接受林则徐的推荐应在林则徐与魏源京口会晤之后，而杨国桢先生则认为，魏源接受林则徐推荐是在 1841 年 3 月，即林、魏京口会晤之前。

雷颐在其《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一文中说，“1840 年，英军进攻浙江定海，正在家奉养老母的魏源听说一个英国军官在浙江海面被俘，便急匆匆赶到宁波前线军营审讯。他根据被俘口供，采以他闻，作成《英吉利小记》。1841 年，当英军再次挑起战火，魏源便投到监督浙江防务的钦差大臣裕谦的幕府工作，积极参加筹划防御。不久，林则徐被贬，流放新疆伊犁。魏源闻讯，在江苏镇江迎送林则徐。两人相见，百感交集，一吐衷肠。”^⑤这也是说魏源曾经两次前往浙江前线：一次是 1840 年主动奔赴宁波军营，参与审问安突德；另一

^① 李汉武：《魏源传》附录，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89 页。

^② 李汉武：《魏源传》，第 40 页。

^③ 李汉武：《魏源传》，第 40-41 页。

^④ 杨国桢：《林则徐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61 页。

^⑤ 《中国近代爱国百人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3-14 页。

次是 1841 年春天主动投奔裕谦，前往定海军营。这种观点与杨国桢的说法相近，不同点在于，杨国桢认为，魏源接受了林则徐的推荐，才投奔裕谦，前往定海的，而雷颐则强调了魏源的主动性，没有说明魏源是否接受林则徐的推荐。

李少军也说：“1840 年 8 月，清廷在得知定海失陷的消息后，任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宁波主持军务。魏源虽与伊里布并无深交，也没有得到伊里布的邀请，但却托友人的关系，很快就前往宁波军中，希望在第一线了解情况。9 月间，他到宁波时，已有定海民众将俘获的英军军官安突德押解到军中。魏源便利用这个机会，通过直接讯问安突德，开始了解和认识英国的过程。当时讯问安突德的内容，魏源整理为《英吉利小记》。”^①又说，“他再次前往浙江地区，正值英军为加强在粤兵力，以浙江当局交还英俘为条件撤出定海之后。但他并不认为从此浙江就可无事，而是将重整海防作为当务之急，并为此进行了苦心研究……主张诱其深入内河而后大创之……同样坚决主战的钦差大臣裕谦当然无法接受魏源的主张……魏源认为自己处于‘骄兵气指挥’的气氛当中，显得孤立，在浙江无法停留下去，因而‘数月辞归’”^②李少军的这种观点与杨国桢、雷颐的观点相近，同样认为魏源曾经两次到达浙江前线，一次是 1840 年 9 月，另一次是在英军从定海撤出后（即 1841 年春天）。作者既没有具体说明魏源第一次离开军营的原因，也没有说明魏源第二次离开军营的时间，只是简单引用了魏源之子魏耆的道光二十二年“数月辞归”的说法。

还有一些作者，也持类似看法，但在分析魏源前往镇海的原因以及离开军营的原因，又有不同看法。例如，安宇认为，1840 年秋天，魏源第一次前往宁波参与审讯安突德等事宜，是接受了“友人”的邀请。而第二次前往浙江镇海，是在裕谦 1841 年 2 月 27 日受命为钦差大臣之后。裕谦一边奏请林则徐帮办军务，一边驰抵镇海，筹办浙江防守事务。“并慕魏源之名派人请魏源入幕，计议天下大事。魏源亦知裕谦之贤，又眼见国家危难，遂抱着报效之心欣然来到裕谦军中。”^③魏源在镇海数月，眼见朝堂无定议，兵将少战心，心中索然，闷闷不乐，遂离开军营。由此可以看出，安宇不仅认为，魏源前往浙江军营时接受了裕谦的主动邀请，而且强调魏源离开军营是他本人不满“朝堂无定议，兵将少战心”现状。

从上述情况来看，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曾经两前往浙江军营，但是涉及具体往返时间和原因时，各家又众说纷纭。关于魏源前往浙江军营的时间，既有 1840 年秋天说，又有 1841 年春天说和秋天说，甚至还有 1842 年说。关于魏源前往浙江前线的原因，既有主动投效说，又有“友人”邀请说，林则徐推荐说，还有裕谦主动聘请说

^① 李少军：《迎来近代剧变的经世学人：魏源与冯桂芬》，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1 页。

^② 李少军：《迎来近代剧变的经世学人：魏源与冯桂芬》，第 152 页。

^③ 安宇、刘旭：《魏源传》，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0 页。

等。关于魏源受林则徐之推荐，既有林、魏京口会晤之前说，又有京口会晤以后说。关于魏源离开定海的原因，既有其不满朝廷和战政策不定说，又有其海防建议未被采纳说。上述各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又相互交织在一起。至于魏源从浙江前线返回扬州的时间，大都说得比较模糊和笼统，要么说在镇海数月而返，要么推测是 1841 年秋天，或者 1842 年，更是含糊不清，莫衷一是。为了求得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我们在此需要对于魏源在浙江军营时间考作一考辨。

二 “1841 年 7 月底以后魏源前往定海说”完全是臆测

首先，应当指出魏耆的说法是错误的。按说，魏耆作为魏源的儿子，他撰写的他父亲的“事略”应有重要价值。可惜，他毕竟不是当事人，他的记述属于他人事后追述，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他说：“道光二十二年，英夷犯海疆，江浙震动。”这句话明显是错误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对于浙江沿海的军事行动有两次：第一次自 1840 年 7 月 5 日攻占定海，阻断了通往长江三角洲的海上通道，到 1841 年 2 月 24 日退出，持续时间为 8 个月左右；1841 年 10 月英军第二次侵犯浙江沿海，相继占领定海、镇海、宁波等城镇，一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退出为止。英军侵犯浙江的时间，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都不能以“道光二十二年”为准。其次，查阅相关历史档案，我们知道，无论是裕谦受命为钦差大臣的时间，还是主持浙江防务的最后时间，都是在 1841 年春天。军机处转发道光皇帝谕令裕谦为钦差大臣的日期是 1841 年 2 月 10 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裕谦在上海摆设香案，接受圣旨的日期是 1841 年 2 月 15 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伊里布在镇海向裕谦正式移交钦差大臣关防的日期是 1841 年 2 月 27 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七日）。由于定海、镇海当年秋天相继被英军攻陷，裕谦投水自杀，去世的时间是 1841 年 10 月 11 日（八月二十七日）^①。因此，裕谦办理浙江军务的时间不是“道光二十二年”。至于，裕谦在浙江督办军务时，是否将魏源“延致幕府”，也存在一些疑点。这在文章的后一部分中我们还要提及。

李汉武认为，魏源于 1841 年秋季前往定海军营，原因是他接受了林则徐的推荐，才成为裕谦的幕僚。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

^①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 册，第 84 页，第 124 页，第 170 页，第 4 册第 198 页。

第一，李氏认为魏源在浙江前线参与了关于定海防御工事的讨论，由于其建议未被采纳而大失所望，当即辞归扬州。查阅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初，裕谦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时洋船已去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以兵五千驻定海……定海孤悬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提督余步云庸而猾，素为裕谦所鄙，一时无可代，姑令筑招宝山，不令渡海调度。三镇又皆武夫，无远略，裕谦所任随营知府黄冕、署定海知县舒恭寿，皆吏才而非边才。及是筑定海外城，葛云飞欲包濒海市埭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裕谦未渡海亲勘，但据图指挥，从之。有诤者曰：‘守舟山已为下策，况所筑者又必不可守之城乎？天下无一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贼左右翻山入，即在城内矣。备多则力分，山峻则师劳，请但环内城为新郭，勿包外埭，勿倚外山，度城足卫兵，兵足守城，庶犹得下策。’既而挠于群咻，议遂不行。至若捐舟山，专守海岸之策，更无暇筹及也。”^①由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如何修建定海的防御工事问题上，的确有过不同意见，文中的“诤者”应当是魏源本人。魏源很可能是由于其建议未被采纳而离开军营。但是，我们认为，这一事件并非发生在1841年8月魏源与林则徐在江口会晤之后，实际上发生在1841年3月4日至8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之间。

按照常识，关于加强定海海防工事的讨论应该发生在准备修筑时期。我们知道，定海工事兴建于1841年的春天（道光二十一年二月），竣工于5月10日（闰三月二十日）。根据琦善与义律达成的《广州和议》，浙江前线的清军于1841年2月24日（即二月初四）遣送了英军战俘，英军于当天从定海撤走^②。定海三总兵王锡朋、郑国鸿和葛云飞就是在这时率领士兵三千人进驻定海的。2月27日（二月初七），裕谦驰抵镇海，接受了钦差大臣关防。五天之后，裕谦奏报在定海修筑土城是出自刘韵珂的建议，并且说明这一方案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因此表示赞同。他说：“昨接抚臣刘韵珂来函，囑于定海城外道头一带，先行挑挖壕沟，建筑土城，适于奴才意见相同，又与奴才前在署两江总督任内修筑宝山县海塘、崇明县土城不谋而合。业已飞飭印委各员酌量地势，即日与办，既资保障又可使乏食难民借觅口食，以工代赈，洵属一举两得。”^③

3月8日，浙江巡抚刘韵珂驰抵镇海，当即与裕谦一道视察了该县招宝山一带海口。他们就定海善后事宜和防御工事反复交换了意见，刘韵珂的奏报可为佐证：“臣一面与裕谦将

^①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0-191页。

^② 《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定海业经收复折》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七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③ 《钦差大臣裕谦奏报英船并未离浙及定海善后事宜折》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92页。

定海善后一切事宜，连日面为妥商，由裕谦专委员弁次第举办。并令臬司周开麒前往定海督率，以期迅速。”^①

4月7日，裕谦第一次详细奏报了定海防御工事兴办情况。“奴才现经督同周开麒、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及江浙文武各员，虚中采访，相度形势，拟于东岳山颠筑做炮城一座，周围一百三十一丈，南面接筑月城一座，计二十一丈。又自青垒山至竹山脚筑土城一道，共长一千四百余丈。又晓峰岭、天样山、锁山各置瞭台兵房，按要安设炮位……所有炮城、土城各工，先经奴才分别督饬，次第兴办。月余以来，最要之道头土城二百三十余丈，仿照河工抢险之法，日逐委员跑牌买土，虽值春雨兼旬，而大小委员皆立于风雨之中，昼夜督筑……截至十五日，查验土方已有八九分工程。其次要之道头以西四百余丈，又次之动岳山以东八百丈，亦有六七分工程。”^②5月15日，裕谦第二次奏报定海工程说：“奴才于二十日渡海亲诣该县周历查勘，新建土城一座，自青垒山起，环绕东岳山、道头至竹山，延袤八里共长一千四百三十六丈四尺。……又东岳山巅震远炮城一座，周围一百三十一丈。又山半月城炮台一座，计二十一丈。各就山势，用石坚筑。奴才往来履勘，土石各工，均于原定丈尺相符，实已一律巩固。”^③由裕谦的这两件奏折可以看出，定海的“土城”工程长为1436丈，起于青垒山，至于竹山。这就是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所说的“外城”工程。既然这一工程到“三月十五日”已动工“月余”，进一步证明关于定海工事方案的决策于二月十六日已经形成。所以，我们把定海关于海防工事的讨论时间确定在3月4日到3月8日（二月十二到十六日）之间，是比较合适的。正是由于魏源的意见不受重视，他才离开了定海军营。关于定海防御工事的讨论，我们认为只能发生在1841年的春天，而不可能发生在林、魏京口见面之后的秋天。

第二，李氏将魏源离开定海军营的时间确定在1841年的秋天，所列举的另一个证据是魏源的《自定海归扬州舟中》四首诗。他说：“诗中明言‘到此便筹归，应知与愿违’，说明在定海时间不久，且与初衷期望大相违背。‘忧患到鸥鹖’之句，与《江口晤林少穆制府》中‘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鳬’其意相同；‘青眼无悬榻，苍穹遣著书’与《京口晤林少穆制府》中‘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频’以及自注‘时林公嘱撰《海国图志》’的情况有明显

^① 《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遵旨折回省城督办防剿折》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36页。

^② 《钦差大臣裕谦奏报赴定海筹办善后事宜折》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第319页。

^③ 《钦差大臣裕谦奏报遵旨验收定海新建土城炮城各工及查办抚恤完竣事》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五日，录副奏折，档号：03-3638-034。

联系。从林魏见面‘遣著书’这点来看,《从定海归扬州》诗应作于《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之后。”^①

我们细细品味《自定海归扬州舟中》与《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这两组诗,感觉思想虽有相通之处,但不能因此断定《从定海归扬州舟中》诗作于《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之后。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从定海归扬州舟中》诗作于《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之前。因为大家公认《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写于1841年8月,而《从定海归扬州舟中》记录的是魏源于春天乘舟返回扬州的情景,“春在浮烟外,帆穿绿树还。草光争赴水,浪影欲浮山。”“尊酒有时有,春风无日无。”由此我们可以断言,魏源自定海返回扬州的时间是春天。既然魏源自定海返回扬州发生在春天,那么,这一事件应当发生在哪一年春天呢?答案只能是1841年,而不可能是1842年。因为,从1841年10月英军再次攻占定海,直到1842年8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定海一直处于英军控制之下,魏源等人不可能在英军再次占领定海的1842年春天讨论如何构筑该地的海防工事。

事实上魏源与林则徐8月在京口会晤之后,一直到9月中下旬(八月上旬)魏源并没有离开过扬州。因为在当年阴历八月上旬龚自珍自丹阳来访,魏源在扬州絮园接待了龚自珍,两位老朋友在一起切磋学问数日。龚自珍为魏源《絮园文钞后集》写了跋语,并在一把素扇上为魏源的侄女魏彦题了一首诗^②。而这一天,正好是英军再次对定海发动攻击的日子。从魏、龚在扬州最后一次会晤,到龚自珍暴卒身亡的9月26日,也就是英军向定海发动第二次攻击的日子,前后不过十余天。在此短短十余天时间内,魏源接受聘请前往镇海,并渡过定海,对于定海已经修成的防御工事提出反对意见,不能说可能性一点也不存在,但很小很小。

第三,李氏之所以认定魏源前往定海军营发生于林、魏京口会晤之后,在于他首先假定魏源前往定海是经过了林则徐的推荐。在他看来,1841年春天并不存在林则徐推荐魏源的条件,他是这样推论的:“第一,裕谦正式接任两江总督负责定海防务的时间是1841年5月25日^③,在2月27日之前定海防务问题由伊里布主持。第一次占领定海的英军退走以后,

^① 李汉武:《魏源传》,第39页。

^② “八月,赴扬州絮园访魏源,为魏源《絮园文钞后集》写跋。某日,先生取素扇书绝句赠魏彦,诗云:‘女儿公主各丰华,想见皇都选婿家。三代以来春数点,《二南》卷里有桃花。’”(郭廷礼:《龚自珍年谱》)正是在这次会晤之后,龚自珍回到了丹阳,于9月26日(八月十二日)暴卒(梁章钜:《仁和龚定庵之事》,《师友集》卷六,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③ 按语:这个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裕谦受命为钦差大臣的时间应当就是实际负责定海防务的时间。无论是军机大臣寄出谕令的时间,还是裕谦接受谕旨和钦差大臣关防的时间,都在2月中下旬。查阅档案可知,谕令裕谦为钦差大臣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1841年2月10日),裕谦接到谕令的时间是正月二十四日(2月15日),伊里布将钦差大臣关防移交裕谦的时间是二月初七日(2月27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第84页,第124页,第170页。

伊里布即派总兵郑国鸿、王锡朋、葛云飞带兵三千名，横渡定海，5月24日登岸^①，25日道光即下令将伊里布交部严议，改派裕谦为钦差大臣。伊里布与琦善、穆彰阿是同声一气的投降派，魏源与伊里布也没有交谊，故在3月之前，魏源不可能参与定海军务。第二，魏源本人与裕谦交情并不深。在裕谦任两江总督以后，能够推荐魏源入幕的只有黄冕。但当时黄冕自己也只是江苏的一个候补知府，在本年1月9日由伊里布带到浙江。伊里布革职后转入裕谦幕，并没有实际发言权。况且黄冕在镇海，魏源在扬州，二人并未谋面，无由推荐。第三，5月3日林则徐离开广州之前，根本不可能推荐魏源入裕谦幕。5月25日裕谦接受两江总督任命，林则徐还在遣放浙江的途中，他并不知道对裕谦和对自己的任命。林则徐在广州时内外交困，自顾无暇，根本不可能与数千里之外的魏源保持联系。到浙江后，林则徐与裕谦只见了一面，就被迫离开镇海。此时即使把魏源推荐给裕谦，而魏源成行，也要在林、魏见面之后。第四，裕谦任两江总督时，他并不知道林则徐来浙之事。6月15日，裕谦在苏州船上收到道光帝的密令，要他安排林则徐到浙后的职务，他才知道此事。林则徐于6月10日到达宁波。7月15日裕谦从江苏赶到镇海，与林则徐畅叙情怀。准备倚林为幕主，搞好浙东防务。但在这天下午，就收到道光帝将林则徐遣放伊犁的命令。此时裕谦才有痛失幕主，而另需幕主的问题。”^②

上面这些推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假设之上，即裕谦延聘魏源为幕僚是接受了林则徐的推荐。在李氏看来，在林、魏京口会晤之前不存在林则徐向裕谦推荐魏源的可能性，所以魏源成为裕谦的幕僚势必发生在京口会晤之后。查阅档案，大抵如此。我们知道，1841年4月16日，军机大臣奉谕：“林则徐赏给四品卿衔，迅即驰驿前赴浙江省听候谕旨”。这一谕旨于5月1日到达广州省城；林则徐于5月3日离开广州；于6月7日到达浙江省城；是时，由于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镇海军营，林则徐于6月10日赶赴镇海，请求代为奏报。为此，刘韵珂向道光皇帝奏报了林则徐的奉旨之后的行程。^③6月28日，道光帝颁发谕旨，从重治罪，令林则徐前往新疆效力赎罪；7月14日，林则徐离开镇海军营，前往伊犁；8月2日，黄河在河南省城开封决口，造成严重水患；8月3日，道光帝谕令林则徐发往东河效力^④；8月中下旬，途径京口，与魏源见面，将《四洲志》资料转交魏源，嘱其编撰《海国图志》；9月2日，在扬州仪征地方接到效力东河谕旨；10月1日，林则徐抵达工次。

^① 按语：这里的时间也是错误的，郑国鸿等带兵接管定海的时间是二月初四，即阳历2月24日。《钦差大臣与前奏为驰抵镇海接受钦差大臣关防并浮筹善后事宜折》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第170页。

^② 李汉武：《魏源传》，第38-39页。

^③ 《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代林则徐报到浙日期事》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录副奏折，档号：03-2707-003。

^④ 《河南巡抚牛鉴奏为遵旨派员探截革员林则徐来谕效力事》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录副奏折，档号：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林则徐向裕谦推荐魏源的资料，不仅没有林则徐的推荐记录，也没有魏源接受推荐的信件，更没有裕谦延聘魏源的片言只字。所谓，林则徐推荐魏源进入裕谦幕府只是学者的一种推测，并无任何历史资料依据，因此这个假设不能成立。既然这个假设缺乏资料支持，其他的演绎推论便没有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 1841 年 8 月林、魏京口会晤之后，既没有一条资料可以证明魏源曾经前往定海或离开定海，也没有一条资料可以直接证明在这一时期林则徐向裕谦推荐了魏源，或者是魏源，或者是裕谦接受了林则徐的推荐。由于 1841 年 8 月底以后魏源没有前往定海的任何记载，因此，我们认为李氏的下述判断不能成立：“魏源到达定海前线的时间是公历 1841 年 7 月底以后和 10 月 1 日定海第二次失陷之前”^①。魏耆称其父亲于 1842 年前往定海，更是不可能的。

三 “1841 年春天魏源前往定海说” 同样缺乏根据

我们仔细研究各家的观点，发现他们说魏源第一次到达宁波的时间是 1840 年秋天，依据的主要资料是魏源本人的记载。在《英吉利小记》的结尾魏源如是说：“二十年，钦差大臣伊里布视师宁波时，源为友人邀至军中，亲询夷俘安突德，爰录梗概，而旁采他闻，以附其后。”^②这是当事人的纪录，尽管时间记载没有具体到月日，但不容置疑。我们只要弄清了安突德等英国俘虏何时接受审讯的时间，就可以确定魏源在宁波军营的大致时间。

根据中英文史料记载，1840 年 9 月 15 日，一艘装备两门火炮载重约 300 吨的英军船只——“风鳶号”在浙江沿海地区进行军事侦查活动，于余姚县滨海地方触礁搁浅，船上人员弃船逃生，船长拿布（Noble）及其幼婴当时溺水死亡，其他人员先后被我国沿海军民救起，从而成为清军俘虏。这些人员包括海军少校德吉利士（Lieutenant Douglas）、拿布夫人（Mrs. Noble）、士兵、船员和仆役等 25 名。16 日，侵占定海的一名叫做安突德（P. Anstruther）的英军陆军上尉带着一名仆役在定海城西活动，被当地百姓捕获。17 日，这 26 名俘虏一同被押解到宁波。在这些英国俘虏中有 3 名成为中国官员重点审讯的对象：安突德之所以被中国官员反复审讯是由于其擅长绘画，便于思想交流沟通；德吉利士由于其官阶最高；拿布夫

03-9331-051.

^① 李汉武：《魏源传》，第 40 页。

^② 魏源：《英吉利小记》，《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2 年印刷，第 905 页。

人则是由于其被疑为英国女王的妹妹，其身份需要得到确认^①。这些俘虏接受中国官员审讯的时间应当是在9月17日以后。审讯英国俘虏的次数可能很多，也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最晚不会超过1841年2月24日。因为，根据义律和琦善在广州达成的协议，英国以退出舟山为条件，换取这批俘虏。这些俘虏于1841年2月24日被释放。

按照《英吉利小记》中的说法，魏源在道光二十年接受“友人”邀请，到达宁波军营，并且参与了对安突德的审讯，我们由此可以推断，魏源到达宁波军营的时间大致在1840年的秋冬季节。有去就有回，魏源此次在浙江前线生活了多长时间，何时离开？理应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在所有论著中几乎没有人提及，令人感到奇怪。

关于1841年春天魏源再次前往浙江前线的说法，主要依据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的一段话。“初，裕谦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时洋船已去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以兵五千驻定海……定海孤悬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三镇又皆武夫，无远略，裕谦所任随营知府黄冕、署定海知县舒恭寿皆吏才而非边才。及是筑定海外城，葛云飞欲包濒海市埕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裕谦未渡海亲勘，但据图指挥，从之。有诤者曰：‘守舟山已为下策，况所筑者又必不可守之城乎？天下无一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贼左右翻山入，即在城内矣。备多则力分，山峻则师劳，请但环内城为新郭，勿包外埠，勿倚外山，度城足卫兵，兵足守城，庶犹得下策。’既而挠于群咻，议遂不行。”^②这段话记载了3月上旬（二月十二到十六日）浙江前线主要官员关于定海海防工事的争论情况，强调了“诤者”（即魏源）对于定海设防的主要看法。在这里，除了可以看到魏源在军营参与了定海防御问题的讨论之外，我们看不出可以显示魏源是“再次”来到浙江前线的任何信息。

关于魏源自浙江前线返回扬州问题，现在看到的唯一原始记载是魏源的《自定海回扬州舟中》四首诗。其中一首诗这样写道：“到此便筹归，应知与愿违。狼烟横岛峤，鬼火接旌旗。猾虏云翻覆，骄兵气指挥。战和谁定算，回首钓鱼矶。”这首诗的背景应当是1840年冬天到1841年春天浙江前线形势。从1840年6月占领定海之后，英军一直盘踞在这里。伊里布受命为钦差大臣后，道光皇帝一再发布谕令，要求尽快收复定海。钦差大臣伊里布对于定海敌军不仅没有采取积极的进攻措施，反而与英军统帅多次进行了外交斡旋，主张通过谈判收复定海。1841年2月24日，清军收复定海后，在如何设防问题上，清军内部有些不同意见。有人主张于东岳山颠修筑炮城一座，于山腰修筑月城一座，于青垒山至竹山脚筑土

^① 宾汉撰，寿纪瑜、齐思和等译：《英军在华作战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3-109页。

^②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0-191页。

城一道；有的主张重点修筑定海县城；有的主张放弃定海的军事防御，诱敌深入，在内河与英军决战。这些意见各有道理，每一种防御方案各有利弊。是时，裕谦已经受命为钦差大臣，他选择了第一种方案。从《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诤者”的主张可以看出，魏源倾向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意见。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于他和三镇总兵的不同观点以及裕谦的选择也作了同样的记述：“方夷寇之退还定海也，三镇以兵五千，往防堵善后，首议修城。其地三面环山，前面滨海，城外二三里，为红毛道头市，长里许。三镇议筑外城，包头道街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有诤者曰：‘天下无一面之城，此海塘，非外城也。贼一翻山入，即在城内矣。备多则力分，山峻则守劳，请前勿包埠左右，勿倚山，但环旧城，再筑外郭，庶城足卫兵，兵足守城。’而议者皆谓：市埠不可弃，且左右高山，我兵居高临下，仰攻不入。时主兵者，未渡海。但据图指挥，遂从之。”^①这里的“诤者”是指魏源本人，“议者”是指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等人，“主兵者”是指2月27日接受钦差大臣关防的裕谦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而不是3月1日起程返回两江总督任所的伊里布^②。这段资料透漏了魏源辞归军营的主要原因，即“诤者”的意见被“主兵者”否定，导致其心情不快。

从魏源下面一首诗中也可以看出，他在浙江前线的生活不太愉快，由于他的建议得不到采纳，感到事与愿违，随时准备离开。“狼烟横岛峤，鬼火接旌旗。”写的是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的情景。“战和谁定算，回首钓鱼矶。”写的是清廷对英军处于和战犹豫不定状态。另一首诗这样写道：“春在浮烟外，帆穿绿树还。草光争赴水，浪影欲浮山。近海烽方傲，严城夜未关。旅人非许国，忧患到鸥鹈。”^③非常明显，这首诗的前两联描述了魏源乘坐船只在春光里穿行于绿色原野的情况，后两联抒发了诗人对于定海在收复之后可能再度遭到英军侵略的极端忧虑。总之，这两首诗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诗人抒发了他对浙江前线1840年冬天到1841年春天的军事形势的看法和忧虑；二是诗人描述了他在1841年春天乘坐内河船只返回扬州的情景。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1841年的春天，魏源不是受聘前往浙江前线，而是由于军营幕僚生活不够顺遂，辞别了镇海的“主兵者”和“友人”，离开了定海，返回了扬州。

从上面的各种原始资料来看，魏源于1840年秋冬季节接受“友人”邀请，前往宁波钦差大臣军营，参与审问英国俘虏安突德等人，而后随同军营转移到了镇海。于1841年2月下旬，魏源随军从镇海渡海到了定海县城。由于在如何建筑定海防御工事方面，魏源的意见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1，议守，道光丁未仲夏（1847年）古微堂刻本，第22页。

^② 《两江总督伊里布奏报回任接督盐篆务日期事》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录副奏折，档号：03-2704-026。

^③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魏源集》下册，第781页。

与三镇总兵相左，没有得到“主兵者”重视，他才于3月中旬离开了定海，返回扬州。在返回扬州的途中他写下了《自定海回扬州舟中》四首诗。以上这些事实，与魏源之子魏耆所说在浙江“数月辞归”是基本吻合的。

四 究竟是何人邀请魏源前往浙江军营

下面的问题是魏源受到何人邀请前往宁波。按照魏源自己的说法，1840年他参与审讯安突德是接受了“友人”的邀请。那么这位“友人”是何许人也？1840年8月6日，道光皇帝谕令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查办海防事宜。8月12日，伊里布于江苏省宝山县接到谕令，立即选调钦差大臣行营得力人员，令京口协副将林明瑞、平望营都司曾得胜、署镇江知府黄冕等文武员弁随身前往^①。9月21日，伊里布等行抵宁波，又调遣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带兵前往。在以上钦差大臣行营的重要成员中，只有黄冕是魏源的好朋友。

黄冕，字服周，号南坡，湖南长沙人。二十岁，官两淮盐大使。1825年，洪泽湖决口，运河梗塞，迫不得已清廷下令实行海运漕米，主持海运的长官是江苏巡抚陶澍和布政使贺长龄。他们素知“冕有才略”，令其前往上海征集沙船。黄冕办理此项事宜尽心尽力，“尽得其要领”，深受陶澍、贺长龄赏识。是时，魏源在贺长龄幕府之中，对于实行海运也极力支持，黄、魏二人自然成为好朋友。海运工程完成之后，黄冕调补江都知县，历元和、上海，署太仓州，擢苏州府总捕同知，晋候补知府，先后署常州、镇江。在陶澍任两江总督时，在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由于黄冕办事甚为得力，有大兴作，“皆依以办”^②1827年，贺长龄升任山东巡抚，魏源没有随往，转入陶澍幕府。由于陶澍、林则徐的关系，加之魏源与黄冕同为湖南人，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关系^③。

魏源作为陶澍的幕宾，一直到1839年7月幕主去世为止。陶澍去世后，陈夔继任。按照当时的幕府制度，行政长官更替，幕宾可就，也可辞。陈夔系湖北江夏人，系陶澍表弟，魏源与陈夔熟识，自然转为陈夔的幕宾。然而当年十月，陈夔病卒，伊里布继任两江总督。尽管魏源与伊里布不太熟悉，但仍转入伊里布幕府。所以在1839年冬季到1841年春季，魏

^① 《清宣宗实录》卷343，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辛巳，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郭嵩焘：《黄南坡事略》，《续碑传集》卷44，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

^③ 黄冕由于浙江战败，被遣戍新疆数年，归来受到魏源的热情招待，有《吴门重晤黄南坡太守》五首诗为证，其中一首这样写道：“相逢依旧十年前，万里归来尚黑颠。试问天山冰雪夜，何如江左月灯船？”（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4页。）

源实际是伊里布的幕宾^①。正因为魏源是伊里布的幕宾，他才有资格被邀请参与审讯安突德。有的作者不考虑实际情况，竟然说魏源听说宁波有英国俘虏，便立即前往审讯，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简单了。军营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进的，英军俘虏不是谁想审讯谁就可以审讯的。也正是由于魏源是伊里布的幕宾，裕谦在镇海接受伊里布督办浙江的钦差大臣关防时，也同时接受了伊里布行营的主要人员，包括黄冕、魏源等人在内。因此，魏源才有可能接受派遣，随军前往定海，参与筹办军务。

1841年2月24日，英军自定海撤退。同一天，郑国鸿、王锡朋、葛云飞即带领各部兵丁进驻，浙江巡抚刘韵珂立即委任石浦同知舒恭受署理定海印务。3月4日，刘韵珂由省会启程驰赴镇海，与裕谦共商浙江海防大计。如前所说，定海的善后事宜是由钦差大臣裕谦和浙江巡抚刘韵珂共同商定的。在当时政治制度下，一旦军事行政长官作出决策，下级官员是不便公开发表反对意见的。浙江按察使周开麒也好，候补知府黄冕也好，无论是赞成还是支持，他们只能表示服从^②。从魏源撰写的著作来看，他似乎不太了解镇海方面的决策内幕，只是认为在定海修建土城是葛云飞等人的主张，与其难免发生争执。魏源的主张不受重视，闷闷不乐，只好离开定海，返回扬州。从以上情况来看，从2月24日英军从定海撤退，到2月27日伊里布匆匆离开镇海，裕谦接受钦差大臣关防；再到3月8日刘韵珂来访，裕谦与刘韵珂连日商定定海善后事宜，并形成决策，开始实施，魏源离开定海的时间大致可以确定在3月份。正是“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时。

如果说，这还是一个推断，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的话。那么，魏源本人的信件就成了关键。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于2008年10月6日公布了魏源致贺熙龄二通书札。其中一通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魏源前往浙江前线以及离开定海军营的原因，由于内容比较重要，加之文字无多，现将全文照录如下：

柘农先生侍御阁下：都门握别，不觉二载。去冬正与黄南坡太守商议《江浙边务》一稿拟寄都中，以备刍献。旋闻台驾已赋遂初，怅然久之。源去年从伊节相至浙江，今春又应裕制军招往海上，襄筹军务。二月，因老亲抱恙，辞归。三月，晤裕制军于吴淞，出定海修城图，与源所拟初稿全不相符。从古但有四面之城，未闻有一面之城，乃竟以土塘为土城可怪也。知贼至，城必不守。曾向南坡

^① 李汉武：《魏源传》，第21页。

^② 当时，周开麒想赴新任，有所推托，裕谦很不高兴。立即奏参。“窃奴才前因定海甫经收复，难民尚未案集，现有大兵驻扎，抚绥设守弹压各事宜必须明干大员前往督办，方臻妥善。查有现在宁波府城办理军需之浙江臬司周开麒精明干练，熟悉海疆情形，奏明飭调该司，带同江苏候补知府黄冕、宁波府知府邓廷彩东渡督办在案。旋据禀称：该司于接札后，适接抚臣行知已奉简放甘肃藩司，诚恐省中委员接署。……奴才察核该司先后两禀，竟似因胜任他省，心存畛域，托故不行，冀图脱身事外。”（《钦差大臣裕谦奏参托故推未知升任藩司周开麒折》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92页。

太守力言之，而成事不可更张，足（是）以七月力辞再招同往之约。有两书复南坡，极言定海城工可为寒心。请乘夷船在厦门攻犯之时，赶筑夹城，接联声势。及弟书至旬日，而定海败报至矣。实由人事，岂尽天运！两载以来，惟知言战言和而不言守。窃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惟守而后可以战，可以和。其守之之法，不出“坚壁清海”四字。“坚壁”，莫要于修城；“清海”，莫要于收渔船及盐犯。弟往来海上，所得惟此数语。乃广东兵退，而省城仍不修；厦门请饷百五十万，而竟无城池；定海筑一土塘为外城，而与内城不接，贼一翻山即入外城之内。此皆粤闽浙三省失守之由。而渔盐之徒尽变汉奸，我不知以夷攻夷，而贼反能以汉攻汉！皆承乎日久，人不知兵之大弊也。闻阁下与果堂太守札，屡询近况，谨陈大概。弟所述明代掌故及武功记略有成书，而少穆先生此公不起用边事终无了局。又属编《外国地里志》，亦须今冬脱稿，容续寄求教。此外，有“节略”一纸，系家乡民瘼，利害切肤，倘能转呈淪斋先生施行，其造福于楚民不小，语详别纸，不复赘陈。敬请近安不庄。魏源顿首。十月初四日扬州寄^①。

这是魏源写给同乡好友贺熙龄的信^②。从“源去年从伊节相至浙江，今春又应裕制军招往海上，襄筹军务”一语和信后注明的月日，可以断定这封信写于即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四日（1841年11月16日）。信中所说的“伊节相”，指的是伊里布。伊里布曾于道光十八年二月被授予协办大学士衔。清代官场习惯，称内阁大学士为相。故魏源称其为“伊节相”。我们知道，伊里布于1840年8月12日在江苏宝山县接到道光皇帝谕旨，受命为钦差大臣，次日将两江总督关防及盐政印信移交江苏巡抚裕谦，即起身前往浙江督办军务。于8月23日（七月二十六日）行抵浙江宁波府城，在此稍作军事部署，旋即前往镇海视察敌情。既然魏源告诉他的朋友他是作为幕僚随从伊里布前往浙江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伊里布到达浙江宁波的时间，就是魏源到达浙江宁波的时间，即1840年8月23日^③。信中所说的“裕制军”，指的是裕谦。明代总督可以节制辖区内文武官员，故有总制之名。清代沿袭明朝旧制，私人信函通常称总督为“制军”。裕谦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在上海接受两江总督印信，故魏源称其为“裕制军”。信中所说的“海上”，是指定海。因此，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魏源先是在1840年8月23日跟随伊里布到达浙江宁波，后来随伊里布行营转移到镇海。1841

^① 夏剑秋：《新发现的魏源致贺熙龄书信二通》，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网站，2008年10月6日发布。

^② 贺熙龄，字光甫，号柘农，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贺长龄之弟。嘉庆十九年进士，历翰林院编修、河南道御史、湖北学政等官职，于1840年辞职归里。

^③ “窃奴才钦蒙恩命赴浙江查办军务，遵于七月十五日在江苏宝山县起程，业经恭折奏明在案。前于二十六日行抵宁波府城，稍作部署，并饬该府县等雇募商船，添造炮位，以备进剿。旋即驰至镇海县，逐加察看。”（《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抵浙日期及筹办攻防事宜折》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二日，《鸦片战争档案》，第2册，第296页。）